

生态文明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王 宁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令世人瞩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中国已经以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身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特别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使得那种把中国人描绘为“东亚病夫”的歪曲形象一去不复返了，而最近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则更是把中国推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只有中国能够挽救世界经济”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我们在讨论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时，往往会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固然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的科技强国政策又使我们我们将发展科技文明的强国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今时代，发展显然已经成为我们既定的国策。但是，我觉得在上述这几个文明的建设中，我们似乎还缺少另一种文明的建设：生态文明。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证明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紧迫。面对全球变暖的严酷现实，面对我们所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愈益恶化，人文学者和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者尤其对之十分敏感。他们或者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或者身体力行，对一切不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行为进行自觉的抵制。还有不少本着对自然和环境负责任的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则大声呼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我们不仅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我们更应该留给子孙后代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这样我们就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无愧于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因此这就需要我们z从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那么究竟何谓“生态文明”？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科技文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众所周知，科技文明是保证我们拥有基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就谈不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主要是从人们的物质需求出发，所要保证的是人类应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以便尽情地享受

充裕的物质消费；精神文明则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试图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精神文化的陶冶，它是物质文明的必要补充和升华。由此看来，这两种文明既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作为基础，我们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精神文明的建设。反之，这一事实也不可忽视：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物质生活越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就越是空虚，越是觉得无所事事，由此而带来的凶杀、酗酒、吸毒、性虐待等社会问题就越多。但在另一方面，这二者又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即这两种文明都是“以人中心”的文明，因为科技文明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和推进才得以实现。因此一切以满足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一个崇尚以人为本的时代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自然的作用以及起码的自然规律却受到了忽视。人们不禁问道，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生态？人类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毫无疑问，在自然生态主义者看来，人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创造的，因此人类的最后归宿也应当是自然。因而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unity of man and nature）。而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眼里，这种关系却被蓄意颠倒了，人的地位变成了主要的因素，自然也因而成了人类的附庸，自然生态的进化与发展总是取决于人的努力和人的安排。长期以来，正是在这洋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主导下，人们缺乏对自然生态的最起码的尊重，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或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往往就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纵观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大发展时期以及更早的时期，我们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大概不难从这些曾经风行一时的标语口号中见出端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一定要治理淮河”；“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如此等等。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禁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人类天生就要以自然生态为敌吗？人类的发展就一定要以牺牲自然生态作为代价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与自然生态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大力发展科技、同时狠抓两个文明的建设时，是否应该注意到另一种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进行反思。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是每一个人的良好愿望，而且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应当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人类要发展经济，以便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因此带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愿望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便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基于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不少人并不认为自然与人是统一的，而是对立的，甚至错误地认为自然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利用。如果不能让人类随心所欲地利用，人类就要与之进行斗争，最终迫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总之，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然屈服于人类的意愿。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有些资源用掉一点就少一点，再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或者说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因此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从而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对于这样的例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历史上和当今的文学作品中见到，也可以在今天的生态批评家的著作中见到。既然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文学作品就应该以描写人为主，不仅要描写人的过去，更要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因此表现理想主义就成了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的危机。通过对人的经历和命运的描写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在这二者之间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来，文学的生态批评率先在北美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反拨和回应。

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始于哲学上的生态主义话语，对于生态批评的意义，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也即生态批评主要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描写。由于在当今时代，仍保持其原始状态的自然已经十分稀少，而一切经过人化的自然则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融为一体，因此，生态写作和生态研究在西方又称作环境写作和环境研究。我在这里将其统称为生态环境写作和研究。生态批评的对象就是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按照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的定义：“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

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¹ 如果说，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然景观中，自然的、原始的成份还居多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未经人类开发的纯粹的自然成份已经十分稀有了，自然大多与人类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或者说大多成了一种“人化的自然”。而生态批评则要通过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引领人们返回到自然的原生态中，让人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原始和素朴。因此生态批评首先发难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其鲜明的解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生态批评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与一种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它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这样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便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则试图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向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由于文学家最热爱自然，最贴近自然，对自然的一切变化也就最为敏感，因而他们的呼唤实际上起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驱者的作用。当然，文学家的声音毕竟是微弱的，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但至少通过他们的（直接的）呼吁和（审美象征性的）描写影响决策者，使他们在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中国当代的一些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所引起的反响中见出端倪。

几年前，在纪念“现代戏剧之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时，南京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排演了一部带有明显的“戏中戏”特征的话剧：《〈人民公敌〉事件》。众所周知，《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在1882年完成的一部社会问题剧作，在作者生前上演时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议，其原因之一恰在于这部剧作是“为未来而写作的”，因而其超前性预言价值在作者生前尚未被认识。作者在这部剧中讲述一位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家乡浴场水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自己的哥哥市长和浴场主的威胁利诱，坚持提议改建浴场，并要在《人民先锋》报上发表文章，试图通过舆论的威力来迫使市政府改正错误，然而

¹ Chery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 xix.

当权者却煽动民众，操纵“民主的”表决机器，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确实，在一个多数人尚处于蒙昧状态时，斯多克芒医生成了少数派，并被视为“人民公敌”，但他却在民众的攻击和冷落中发现了一个真理：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往往就是最孤独的人。由于他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说出了真理，因而也就成了最孤独的人。

一百多年后，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现实被易卜生这位天才的预言家言重了：淮河沿岸，类似《人民公敌》剧中的事情发生了，一群大学生暑假回到家乡时，目睹了污染的淮水河，痛感家乡问题的严重。只可惜没有易卜生这样有着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来为民请命，因此他们决定排演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试图通过文学的力量来唤起家乡父老治理污染源的觉悟和决心。但是，他们却遇到了与《人民公敌》剧情中相似的多方阻挠和刁难。周围的亲朋好友们在他们了解了他们排演话剧的真正意图之后，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以种种方式从中作梗，最后迫使这群大学生还没走出象牙塔已经悲哀地发现：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赚钱，不讲道义的人所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更严重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玷污了人们纯洁的心灵和道德良知。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今天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类似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挪威，更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发生在作者所写的淮河边，还在更多地方普遍存在。”² 因此中国需要易卜生这样的文学家，尽管文学家的声音并不强劲到迫使人们改正错误的地步，但至少会使他们停下来思考自己的错误究竟在哪里以便能够及时地改正错误。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应尽的积极的启蒙义务。

诚然，要在一个技术官僚和科技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就要首先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专断和排他意识，使人重新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己的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竟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因而也受到了自然的无情报复。我想我们应当首先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作一些反思。不可否认，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并膨胀了人类试图战天斗

² 参阅傅谨的文章“中国为何没有易卜生？——由《〈人民公敌〉事件》想到的”，《北京日报》2006年9月12日号。

地的野心，促使人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逐步形成和膨胀。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自然果真是人类可以任意征服的对象吗？人与自然、与周围的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一种可以轻易征服和控制的关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显露了出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内频频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水和干旱，这些自然灾害无不在向我们提出警告，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向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前几年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和2009年出现在部分国家的甲型H1N1流感的冲击为人类生命的可持续性繁衍罩上了可怕的阴影，而近年出现在亚太地区的印度洋海啸更是向人类敲起了警钟：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后患无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我们更应该对之作出自己的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生态批评在当代理论界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环境伦理学。³ 我认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由此可见，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启蒙和先驱作用，但是由于生态文明的建设与我国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参与。在这方面我不妨提出自己的不成熟看法。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充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切以自然的需要为主，而不是把人类的愿望强加于自然，这样便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建设生态文明，还要树立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也就是说，在不得不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充分发挥科技文明的优势，并基于精神文明的伦理道德观念，力求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使之不至于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比如，在发展汽车工业时，一方面合理地使用现有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研制和开发新的能源，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而在水资源的利用中，一方面号召人们节约用水，

³ 关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参阅拙作，“后现代生态语境下的环境伦理学建构”，载《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6期，和《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使现有的水资源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则合理地有计划地使用水资源，此外还要调动高科技的手段低成本地开发新的水资源。

建设生态文明，我们还应当具有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爱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种动物物种，平等地善待它们，使它们和人类共同生存下去。众所周知，人类只有在自然界的巨大生物链的进化过程中才得以生存和繁衍，消灭任何一种动物，都不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尽管有些动物对人类确实有害，并被视为人类的敌人，例如狼，但只要我们建立人类自身的保护机制，我们就能够有效地“与狼共存”，甚至“与狼共舞”。

今天的自然生态写作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总是免不了会提到美国 19 世纪超验主义文学的先驱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梭罗作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鼻祖，认为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外，即使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中愉快地生活。他生前曾身体力行，于 1848 年拿了一把斧头，到康科德郊外的树林中搭建了一座小木屋，然后每年劳动 6 周，其余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他的生活实践被称为“梭罗式的”素朴的生活，在当今的欧美国家颇为风行。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效法梭罗，隐居在荒山野岭，静心地思考和写作还有人出于保护生命的动机成了素食主义者。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试图建设生态文明的尝试。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在一个具有各种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提倡梭罗式的素朴生活至少是对奢侈喧闹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拨。我本人虽不想效法梭罗去过那种隐居的素朴生活，但我对当代生活的多元化是深为理解的，因为这有利于建构一种后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同时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对于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无疑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美国生态主义的先驱梭罗等人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和启迪。但是现代西方人为什么会比我们更早地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呢？因为他们先于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并在丰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古代哲学中既然有着丰富的生态学资源，并对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有着启迪和影响，为什么我们作为孔子和

庄子的后代，就不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再次起到先驱者的作用呢？在此我再次重申我一贯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中国应当对全球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中国更应当对世界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